

湘南豆油香

江业成

对于厨房，我是喜欢的。那种火苗跳跃、锅铲咣当、菜香氤氲的场景，很烟火、很享受。但为生计，“吾媚吾口”的陶翁桃源生活只存念想。

人多有桃源梦，我也不例外。桃源在哪？不想与老家豆油的期不期而遇，让我对桃源有新的体悟。去年中秋友人寄来豆油，说可尝出家乡味道。豆油，二十几年不曾见着，急不可待地拧火热油，豆油入锅，浓郁的黄豆香味瞬间弥漫。妻子探头问，什么味？豆油的味，儿时的味，刹那唤醒的味蕾记忆让旧日时光倏地生动起来。

豆油以黄豆为原料，发酵酿造，油亮膏体，香味独特，曾是湘南桂阳、永兴一带乡下百姓最爱的调味品。外地人初闻多半会皱眉头，但这味道却是当地老人的至爱，后辈小生对此味也始终莫名地亲近与喜欢。

老人回忆，20世纪70年代，每斤猪肉7毛，豆油可卖6毛多，乡人可食无肉，但不可无豆油。爷爷就是铁粉，一餐无豆油，就觉寡淡。爷爷穷得冬天把蓑衣当被子，却从不吝啬豆油。“走，爷爷带你到墟上买豆油去。”这是我儿时最常听到的话语。

老家洋布坪为乡村墟场，每逢赶墟，人头攒动。卖豆油的角落无疑是最新热的，四五张二米许的木桌一字排开，每桌摆二三个盛满豆油的陶盆，旁竖大布伞一把。卖豆油的伙计肩搭粗布汗巾，腰系黑色围裙，手持长柄木勺，嘴里吆喝“王家豆油香哟”“周家豆油好噢”。这一幕过去二十几年仍如版画般富有质感。

我不知道那个年代，豆油给了乡亲们苦生活怎样的慰藉，但我知道对爷爷来说，豆油是菜的魂，也是生活的味。

豆油长期只盛于湘南农村一隅，其故事也自带乡味。传说湘南一村妇，某日煮食黄豆过多，怕婆婆责骂，洗净藏柜厢，婆婆发现长霉，逼其吃掉，媳妇将霉豆入锅，抹泪熬煮，不想香气扑鼻，尝之鲜香。

受工业化调味品冲击，豆油在20世纪末日趋没落，有些早年难见其踪影。有说不卫生、不健康，有说太辛苦、成本高。据老匠人介绍，选豆、蒸熟、生菌、洗霉、发酵、沥汁、熬制，传统酿造豆油需15天、72道工序，每天要在高温作坊劳作十几小时，一瓶豆油料可制上千瓶酱油。

乡里产豆油最盛时，有作坊十几家，今仅剩塘村老邓家。老邓家曾搬到城里，水土不服又回乡下。听人说，老邓家子女经商，生活富足，酿制豆油，纯属执念。庆幸的是是豆油制作技艺近年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对豆油也有新知，据食品工艺分析，黄豆富含蛋白质，宜长有益霉菌，风味独特且生态健康。

自再见豆油，豆油就成厨房必备，惊诧的是城里长大的儿子对豆油也一见如故。一家人围桌而坐，闻豆油香，吃家常菜，说东道西……此时此刻，如存在主义哲学所述：我是我自己的自由，不多，也不少。

自由舒展的生命状态里，我隐隐看到挂冠归去的晋人陶渊明在葛巾漉酒，听到历尽劫波的宋人苏东坡在月下欢声笑语，闻到清代寒士李渔构筑的诗意伊园里四溢的花香。生活从来不缺真味与清欢，即使困苦，也可活出品位与欢愉。

桃源生活无非是对心灵的安顿，抚琴听风是隐士的桃源，舞文弄墨是文人的桃源，含饴弄孙是老人的桃源。谁又能否认，豆油香浓不是爷爷的桃源？酿制豆油不是老邓的桃源？

桃源在哪？也许只要一轮明月，一种执念……只要保持对生活纯粹的热爱，每次愉悦的审美体验都是桃源生活的抵达。

于我，只要一缕湘南豆油香，就有了自己的桃花源。

征稿启事

传统古村是历史文化的宝贵遗存，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。湖南有许多美丽的古村落，它们或隐藏在山水之间，或散落在群山怀抱里，或镶嵌在绝壁之上，静谧古朴，悠远美丽，并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。为探访三湘大地的传统村落，展建筑艺术，观民俗风情，聆听历史长河中那些久远的故事，感受诗意与乡愁，同时，抒写时代新貌，反映乡村振兴中的发展与变化，《湖南日报》湘江周刊特推出栏目《古村新貌》，欢迎读者积极投稿。

文章须为原创作品，有现场感，主题鲜明，语言生动。体裁不限，报告文学、散文、诗歌均可，字数不限，原则上2000字左右，有配图更好。来稿请寄539876330@qq.com，并在“邮件主题”处注明“古村新貌 征文”。作者须留真实姓名、详细通信地址(含身份证、银行卡及开户行)等信息。湘江周刊和湖南客户端湘江频道将从征文来稿中择优刊登。

这里有九百座古祠堂



汝城益道村范氏家庙及绣衣坊。

乔育平 摄

王琼华

这日，朱德走进汝城津江村的朱氏祠堂时，看到祠堂气魄恢宏、庄严肃穆的格调，眼前当即一亮。

当晚，他即在祠堂厢房中留宿。

这一年是1927年。

11月下旬，朱德带领南昌起义部队中的教导队一行，从江西转移到汝城，驻扎津江，与驻军当地的老同学、国民党某部军长范石生谈判，获取合作契机。津江村作为部队落脚点，这是朱德充满智慧的一个选择。津江，一个千余户人家的朱姓大村庄，与朱德属同姓同族，自然多给了部队几分安全。在这村里，朱德秘密重建了农民协会，又招收士兵近200人。在朱氏祠堂，朱德与陈毅召集湘南粤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。半个多月后，朱德在离开津江时，当地村民想请朱德写一块“朱氏一家”匾额作为纪念。朱德当即说：“全世界劳苦大众都是一家。”听到这话，村民们胸怀豁然开朗。接着，朱德亲笔题写“世界一家”四字。村民连夜打制匾额，天亮时悬挂于祠堂内。

之后，朱德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。

至今，这块匾额仍挂在祠堂正厅流光溢彩的横梁上，成为该祠堂第一宝贝。

津江朱氏祠堂仅是汝城古祠堂其中一座。据专家多年考证，汝城目前保留着始于宋元、盛于明清的古祠堂940余座，堪称全国规模最大的古祠堂群落。央视为此专门拍摄了《汝城祠堂记》。一位北京来的教授在考察汝城古祠堂后，不禁赞道：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建筑瑰宝！

当然，众多来访古祠堂的游客更惊艳这些建筑上精湛的工艺与非凡的匠心。

再以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津江朱氏祠堂为例。我的少年就是在津江村度过的，那时就知道朱氏祠堂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。门楼坐南朝北。家庙坐西朝东，由门楼、上厅、中厅、下天井、下天井、厨房六部分组成。汝城古祠堂大多这般格局。仔细看去，这些古祠堂皆见不少精心之处。如朱氏祠堂，其门楼斗拱飞檐，属单檐歇山式样；对门由木栅栏门、双扇门、拱式门组成；即前为石狮子，雌狮嘶吼，雌狮亲昵，如此搭配，自然和谐。鸿门梁雕雕三层双龙戏珠，栩栩如生。上端紧贴浮雕八仙、仙翁等神像；中端刻“砺山毓秀，汝水钟祥”八个大字，寓意朱氏始祖源于安徽砀山县；顶端饰以鳌鱼。门联为“汝水自东来，汇津江达义井世代渊源可溯；朱门当北立，跨锦石跃金瓜颡德泽延绵。”它道出了津江朱氏前世今生，渊源深厚。而古牌坊格外雅致，上方堆塑“金龟毓秀”，下方梁面刻石质三层浮雕“双龙戏珠”，梁下中央有“风云际会”牌匾，左右两边依次浮雕镀金龟、钓金鱼、八仙过海等古代故事。祠堂还藏有乾隆年间“重修朱氏家庙碑志”。祠堂前有一条小河。掠水轻鸥晴自戏，凌风飞雁暮争还。如此景致，万般迷人。

汝城古祠堂不仅是一部家族史，也是反映当地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而在我眼里，堂号、堂匾与堂联是古祠堂三大文化符号，汝城古祠堂也因此有了不一样的灵魂。

陇西堂、五礼堂、克复堂、紫微堂、叙伦堂……这些令人眼花缭乱又景象万千的堂号作为祠堂的古老称谓，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，大多结缘发源地、典史、名官、赐赠或敦教而得，体现价值取向和美好祈愿，而且一定鲜明表达了道德、忠孝、勤奋等立意。斗山村曾氏祠堂，其“三省堂”，即是以名言作堂号，典出曾子故事。《论语》“学而篇”记载一语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以此作堂号，在表达曾氏本源的同时，也弘扬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。多少年来，斗山村曾氏仍然保持谦卑这种品性。

堂匾，古祠堂“身价”的表达，寓意深长，而且文采激扬、情趣盎然。

“五经世第”，这一块名号堂匾悬于津江朱氏祠堂。据史料记载，先祖朱诚操守高洁，学问渊博，通晓“五经”，即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，所以被称为“五经先生”。这堂匾也

是一种“唯有读书高”的指引。金山卢氏家庙的“南楚名家”则属荣耀门匾，取自于宋朝太宗赵光义赐诗“楚国之南皆名家，家声远播耿朝纲”一句，颇见不凡。益道范家的“中丞公祠”，属朝廷赐建于1522年，以此纪念范格。而堂匾中所称“中丞”是对范格的尊称。出生范家的范格，曾任南京御史、按察司副使、江西右布政使、宁夏巡抚等职。翻书时，我曾见礼部尚书范谦为这位明朝最著名的监察御史作传记赞曰：“公居官三十年，家无长物，仅存俸银九十两，布衣木笏，守父田九十工耳。为人好学，励行刚方，廉洁忠义，俭约、恤寡怜贫，彰善嫉恶……除逆党，劾贪污，却馈金、焚妖皮、勤政恤民。”至今，在范氏宗祠前，仍保存有一座明正德年间专门为旌表监察御史范格而建的石牌坊——绣衣坊，它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专门表彰监察御史的牌坊。这一一坊相得益彰，自古就成了本村甚至属于全体汝城人拥有的培根铸魂之地。

堂联，则在彰显祠堂底蕴。

范氏家庙、三星何氏宗祠悬挂有当朝重臣杨慎、张居正题写的堂联等物。更引人注目的是其堂联内涵。“国勋已见排诸吕，家学曾经授二程。”先锋村周氏宗祠堂联短短十四字，却精彩生动地讲述了与周氏有关的重大历史和文化事件。上联中的“国勋”指西汉开国大将军周勃；“排诸吕”意指以周勃为首的汉臣诛杀阴谋叛乱篡权的皇亲国戚，迎立刘邦次子代王刘恒为汉文帝。下联讲周氏家族把影响中国思想史七百多年的宋明理学称之为“家学”；“授二程”则指宋代道学宗主周敦颐授教理学继承人程颢、程颐兄弟的故事。“二程”在汝城从师周敦颐春游至城郊予乐湾时，写下《春日偶成》一诗，名列《千家诗》之首。三星镇城头村邓氏宗祠有一堂联，即“末水渊源清碧流江汉，天马盘踞将锁乾坤。”这副堂联揭开当年神农在何处作耒耜的谜底。它当然取自于史实。《衡湘闻录》记载：“神农作耒耜于郴州耒山。”而《万历郴州志》明确指出：“耒山在桂阳（今汝城）县南，四面孤绝，耒水所出之南。”同治年《桂阳县志》记载更为详细：“耒山，在县南五里即城头寨，巉岩峭壁，高二百步，迢迢一百二十丈。寰宇记（即《寰宇记》）耒山在郴州义昌（今汝城）县。考县址与城头寨邻。其南来水流岫脚即耒水也。山下水深莫测，山形首耸身扁而平，俨一耒耜，又名天马山。”耒山即城头村旁的城头寨。春来，我与友人来这城头寨寻古，见那一股末水清澈见底，碧波荡漾，潺潺往东流去。此地就是当年神农作耒耜的地方。耒耜是华夏民族第一件农耕工具。它的出现，标志着中国从渔猎社会进入了农耕文明。如今的城头寨郁郁葱葱，一派惹人喜欢的田园风光。村里一老者跟我说过，不管哪个年号，山下这一片田土都是五谷丰登。汝城作为华夏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，至今仍保留着祭神农、拜田祖、栽米树、曲木为犁等传统风俗，并有神农农、耒水泉、耒水桥等古遗址，它们与古祠堂一起构成了汝城文明进化的重要篇章。

汝城古祠堂有其特殊功能。它一直发挥慎终追远、惩恶扬善、耕读传家和聚会议事的作用，也是冠寿婚丧和年节喜庆的重要场所。我印象中，那年一条36米长的香火巨龙就是在益道范氏家庙中扎成的，轰动一时。探访新井叶家、大坪欧村祠堂时，我欣喜发现两地皆保留有《文课碑记》，记录着倡导读书、激励后人的事迹。我每次去访官坑村，当然会走进胡氏宗祠。这一刻，一个历史场景又鲜活地展示在我的眼前。1934年红军长征途经这个村子时，由于连日的奔波征战，缺粮少食。村民胡四海召集族人，聚集在胡氏宗祠商议为红军筹集粮食。不日就筹集了105担谷物以及3头生猪、12只家鸡送到红军的手中，支援红军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，为中央红军长征在汝城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红军离开开寿时，时任第三军团司令长叶祖令特意写下一张借据。1996年这张借据被发现，之后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。其实，古祠堂中的众多花絮都让我感慨万千。

让我叹服的，还有我的母亲。

母亲是一位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学生。小时候，我回到外婆家殿华村，母亲带我看祠堂。那村里也有好几座古祠堂，该是刚刚修缮了一番，所以我赞道，这些工匠真厉害，竟然让古祠堂那些图案栩栩如生。母亲却说，古祠堂是有精气神的，它是祖祖辈辈用人心血与汗水赋予而得。

很多年后，我才理解了母亲颇有触悟说的这句话。是啊，古祠堂所有的元素，其实都是人的气息。所以我才有了“欣赏一座古祠，仿佛穿越一段历史的长廊；会晤一座古祠，犹如聆听一位苍老明世的长者心声”一吁。

在汝城历史与文化进程中，尤其是有一个人的见识深刻影响了古祠堂的构成和内涵。

他就是周敦颐。

北宋皇祐年间，周敦颐来到汝城（时称桂阳）担任县令。《宋史·周敦颐传》称：“移郴之桂阳县，治绩尤著。”足见他履职履责。在励精图治的同时，他开闡理蕴，著书立说，从而建构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与骨架，被尊称为“道学宗主”。得此熏陶，汝城古祠始终坚守以诚立道、五常为本的初心。即便今日，走进古祠，仍可看见祖上留于大门两侧或大堂上四个醒目大字“忠孝廉节”，皆为理学家朱熹手迹仿体。祠堂两边一般有两条巷道，巷门上分别书写“礼门”“义路”。

可见，周敦颐的理学主张在汝城古祠堂得到彰显与弘扬。

先锋村周氏与周敦颐一脉相承，所以其祠堂内外以莲花为题材的诗文、图案比比皆是。让我感到惊艳的是这座古祠中的“雀替”纹饰，也属莲花为题材。当地匠人大胆采用写实的手法，镂空透雕，立体感强，让莲花莲叶呈“S”状，迎风摇曳，很富动感，童子坐于莲叶之上，形象憨态可爱。我记得中央电视台曾对此作过报道。有一次，县文联主席李英燕带我去欣赏她刚发现的金山祠堂以“飞鸟”为图形的“雀替”，这种力学上的构件忽然间演变成美学的构件，即便在汝城古祠堂中也算极为罕见的。它有新的寓意。村里老者介绍，称此依照周敦颐在汝城所著《太极图说》中“一阴一阳，互为其根”的论说设置，以“飞鸟”纹饰为图，童子坐于莲叶之上，足踏祥云，长长的凤尾回旋飞舞，舞姿优美，动感十足，让我们叹为观止。

时至今日，古祠堂文化仍见独特魅力。

国庆节前一天，我参加文友的婚礼。他的新娘将自己的婚礼选择在范氏家庙中举行。新娘说：“这场婚礼，让我们接受一场心灵洗礼。”传统婚礼的回归，不仅仅是撩开红盖头那般简单。古祠堂内那些文化标签一定会让新人有许多新感受。

古祠堂本来就是一座文化殿堂。受其熏陶的人，也一定秀外慧中。

包括朱舜华。

100多年前的某个早上，津江村这位叫朱舜华的姑娘站在祠堂跟先祖牌位深深鞠下一躬。走出了祠堂，她仍回头眺望了朱氏祠堂一眼。

这天，朱舜华离开了家乡。因为与闺蜜约好了，她需要尽快赶到长沙。朱舜华的闺蜜便是杨开慧。她的另一位闺蜜何宝珍，即刘少奇原夫人，此时也在长沙等候她。时隔不久，即1922年10月，在清水塘毛泽东家中，朱舜华握拳宣誓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她的人党介绍人便是毛泽东和杨开慧。之后她化名张琼，参加北伐战争和地下工作。从此，朱舜华成了一位勇敢的革命战士。前些年，解放军报社编审、作家田树德经过多年调查研究，所作《揭秘：最初向毛泽东推荐上井冈山的人是谁？》一文中有一个定论：朱舜华是当年向毛泽东推荐上井冈山的第一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朱舜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。她知道，文化的熏陶是多么重要。要不然，她当年离村时，唯一的一个回眸，怎么就会给了她熟悉的那一座古祠堂？！

也许，这些祠堂并不古老。

因为我看到，一对又一对新人走进祠堂时，它已经蓦然焕发出了一种青春气韵……

毛定之

最后一次去家里看张叔叔是四五年前，当时他中风不久，腿脚没以前灵便，精神尚好。

认识他始于1986

年底。

那年，我到北京出差，也是第一次进京。老丈人听说我去北京，满心欢喜地说：“你去找张叔叔，他人最好哒……”初到北京，人生地不熟，我便去找他。

张叔叔是老丈人山沟里的老战友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在一支驻扎在晋北山区的部队中，老丈人、张叔叔同在此服役。70年代后半期，老丈人转业回地方，张叔叔去了北京。在部队，他们都是“穿四个兜”的干部。

初次见面在张叔叔家。北三环边上一栋单位宿舍六楼顶层二室一厅的房子，南北小阳台，有煤气水电，这在八九十年代算不错的房子了。当时张叔叔不到五十岁，他质朴的笑容、温和的话语，很快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他个不高，不到一米七，不胖不瘦，一张老农似的脸，眉毛又浓又黑，嘴唇敦厚，牙齿白稍腴。说话不紧不慢，表情和善。

第一次去，就在他家吃了顿丰盛的晚餐。印象最深的是一大盆卤猪蹄摆在桌上，咸淡适中，肥而不腻，几块下肚，齿颊生香，欲罢不能。见状，他抿了口酒笑着说：“喜欢呷就多呷点，随便一点。”他当时在工厂的食堂当厨师。由干部变成工厂食堂厨师，他说：“干什么都是干，现在蛮好！”

我此行是为后续要来京参展的“大部队”打前站，第二天，张叔叔带着我四处找宾馆招待所，看条件怎么样、价格贵不贵，直到安排妥当。

他完全把他当作了家乡来的亲人。我也完全把他当作了远在京城的亲人。

那趟差真是出得长，在京待了一个多月，后来我父母也因事来京。张叔叔听说我父母也来京了，无论如何要请他们到家吃饭。我觉得不好，我父母也觉得不妥，毕竟他们从未见过面，互不熟悉。但张叔叔很热情，诚心诚意，多次邀请，这样，我们一家就在他家相聚。拉家常，吃湘菜，乡音乡情如同浓醇的美酒，醇厚而绵长。十多个人挤在一起品尝美食，很是热闹。现在看，也够麻烦的。

90年代，我调北京工作，放下行装第一个去看的就是张叔叔。他喜出望外，直说：好好，行呀，小家伙！

初到新单位，挺忙，全国各地到处跑，我也只能一两月去他那一次。每次，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，放松舒坦。高阿姨总会做几道可口的家常菜，我也肯定是毫不客气，饱餐一顿后满意而归。

他的兄弟姐妹都在乡下，自己孩子要上学，经济上并不很宽裕，但他每年要给农村的亲戚汇点钱。有次去他家，他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哥哥来了和他住在一起。

连续好多年，春节前我都去跟他拜年，给他送些腊鱼腊肉等年货。张叔叔很高兴，也常说，你们都忙，不要跑了，打个电话就是。他的两个儿子干得都不错，老大当公司老总产业做得很大，老二同样自创业日子也过得去。但他仍然住在顶层的小两室里，没有电梯，天天爬上爬下。我说，张叔叔怎么不改善一下条件，住宽敞一点？他说：“嗨，在这都习惯了，蛮好！”高姨摇摇头撇嘴一笑说着：“老张就这德性，不愿给儿子添麻烦！”

确实，他把“蛮好”挂在嘴边，实则自己本为“蛮好”的一个人！他有大智慧，但简简单单、实实在、透亮亮，没有一丝虚情假意。

我真心喜欢。

后来，他再次中风后，生活已无法自理，住进了养老院。感染新冠后，不能进食，平静离世，享年83岁。

